

简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

——以川陕苏区时政歌为例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川陕苏区曾经产生过大量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样式,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光耀史册的巨大社会变革;率真地讴歌了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这些歌谣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形式的完美结合,其中的时政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

关键词:川陕苏区;红色歌谣;搜集整理;时政歌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4)06-0012-04

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在川陕苏区那血与火的年代,曾经产生过大量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富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样式,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一段光耀史册的社会变革;率真地讴歌了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之情;密切地配合了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

一、红色歌谣的产生及搜集整理

川陕苏区时期产生的“红色歌谣”,是不可再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耳熟能详的民间歌谣形式的完美结合;同时,它也是巴人“勇健好歌舞”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因其特殊的珍贵价值和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便有多次对红色歌谣大规模的、全面的搜集整理,使曾经口耳相传易于流失的作品以文字定型化,得以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

(一)巴人“尚武”、“俗喜歌舞”的品性

生活在大巴山、秦岭一带的古代巴人,在蛮荒的土地上极其艰难的生存着。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落的包围中,一面不断的征战、奋发图强,一面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

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练就了巴人劲勇刚烈,不畏险阻、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品性。当代史学家陈世松先生在《天下四川人》中分析说:“生活居住在川东北丘陵地区的居民,即所谓巴人,原本是一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其后,巴人较长久地保持着山地农耕兼渔猎部落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强悍的以战斗为职业的部落。艰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锻炼了巴人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坚强、直率的心魂。因此,‘尚武’成为这一地区居民的个性特点和文化品格。”^[1]“尚武”精神一脉相传,在川陕苏区时期,十多万川东儿女参加红军,在革命战争年代,三万多川东儿女在浴血奋战中牺牲,便有了英雄辈出和“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的形成。

巴人又“俗喜歌舞”。晋代史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当代史家童恩正教授就此解释说:“其目的除了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以外,往往还带有巫术的作用,即企图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战胜敌

收稿日期:2014-06-21

作者简介:陈正平(1948—),男,四川平昌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民俗学研究。

人。”^[2]汉高祖刘邦将这一“武王伐纣之歌舞”引入宫廷,命乐人学习,正名为《巴渝舞》。《巴渝舞》实为我国“战舞”(或曰“武舞”)之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族的地方民歌就声名远播,传到了楚国。《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下里巴人”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审美层次,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以其质朴俚俗、通俗晓畅在当时和后来都十分流行。

宋代地理学家乐史在他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巴渠风俗》中,记巴渠人“其民俗聚会以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竹枝歌又名竹枝词、竹枝调、巴渝词,盛行于唐宋,流行于巴渝,后至荆楚地区。有论者高度评价竹枝歌乃“诗之国风,辞之九歌也”。^[3]起源于农事活动的民歌演唱“嫫草锣鼓”,在汉代就已成型,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川东北地区。这些影响深远,传承不息的巴人歌舞,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篇章,它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变异,反映了一方民众的社会历史、精神生活与风土人情,闪烁着人民智慧的光芒。

(二)“红色歌谣”是特定时期的产物

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县城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员会,接着,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华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强化了党对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它的出现,使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现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带来更大变化的是苏区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时事”是红色歌谣产生的根本要素,巴人“俗喜歌舞”是红色歌谣产生的文化背景。

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认为:“民间歌谣是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生产劳动与社会斗争等)过程中,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韵文形式;更确切地说,民间歌谣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4]大量

出现的过去时代所没有过的红色歌谣,是民众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表达了民众对时事的情感倾向和政治态度。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腥风血雨的军事斗争,“夺回了地夺回了田,夺回了自由夺回了权”。民歌成了民众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然的表现形式,从没有过的革命豪情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令人“不吐不快”、“且歌且谣”,这一时期大量产生的“红歌”成了地方歌谣史上的“喷发期”。

(三)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

我国早在周代即已有了民歌搜集的“采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和小雅的一部分,就是当时从各地采来的民歌。为了抢救、发掘我国各地各民族丰富悠久的民间文化,自1949年到1966年“文革”17年间,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在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特别是1958年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民歌“采风”运动。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精神,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在此期间,四川各县都出版了搜集到的包括“红色歌谣”在内的民歌集成资料本。

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当时的中共达县地委宣传部、文化局按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达县地区各县(包括今达州市、巴中市各县和广安市邻水县)文教部门约六千余人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长达五年之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选编和资料本出版工作。在各县出版的当地《歌谣集成》中,包含了大量的苏区红色歌谣。

1991年至1992年,原达县地委在中共地方党史资料征集、政协地方文史资料征集成果的基础上,从革命文化方面重作开拓,纵深发掘,组织各县“征编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编辑出版了当地《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辑》资料本,在此基础上,达县地区文化局在1993年出版了《四川达县地区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资料本。这些内部出版物中,收录了不少“红色歌谣”。

新时期公开或内部出版了几种“红色歌谣”选

本,如《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1981年)、《川陕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上、下)》(1984年)、《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1985年)、《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歌谣》(1987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歌谣选编》(2005年)。还有部分红色歌谣散见于各种史料中,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等等。从地方党史、地方志、档案资料中,从健在的革命老人、历史文化事件的亲历者、知情人、民间老艺人的口中,都获取过部分红色歌谣。这些,都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的时政歌

川陕苏区时期的时政歌,是劳动人民有感于过去切身所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创作的歌谣。它表达了劳苦大众对剥削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面貌和对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何其芳在《论民歌》中指出:“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及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5]时政歌被比喻为“匕首和投枪”,它有明显的揭露性和讽刺性,语言精炼、形象,常用隐语、谐音,一般篇幅短小,以只说不唱、琅琅上口的民谣为多。它最能直接及时地反映现实人生,表达民众的情绪、思想、愿望,易记易传,战斗性强,常常成为时代的风雨表。

(一)“川北穷人真可怜”

川陕苏区位于大巴山、米仓山一带,山势陡峭,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军阀和地主恶霸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农民一生受压迫》、《穷人苦》、《穷人泪汪汪》、《穷人白骨堆成山》等歌谣,揭露了黑暗统治下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痛苦。

四川各地的军阀与地主、官僚、流氓、特务和土匪头目联成一体,镇压革命,屠杀群众。他们组织了“清乡委员会”,杀害共产党人和“被赤化”的群众,但苦难中的民众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他们看清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作出了“大路不平就要铲,世道不平要造反”的理智选择。从川陕苏区走出的达州人魏传统将军回想当年时指出:“巴山蜀

水,广袤秦川,原是富庶之地。但在旧中国,官、匪、租、捐、役诸多绳索,却将那里的穷苦劳动人民缚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呻吟、在咒骂、在奋起。”^[6]“反动政府搜刮民财的名目繁多,一年要提前征收数年的粮,捐税不下百余种。烤火要收‘火笼捐’,煮饭要收‘搭钩捐’,抽烟要收‘烟袋捐’,走路要收‘过路捐’。”^[7]旧军阀刘存厚在达县一带统治十多年,曾在1932年就将赋税征到1943年,征税名目达数十种。许多歌谣反映了民众对“刮民党”横征暴敛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如《刮民党万万税》念道:

要说“睡”,就说“睡”,一生一世难得“睡”。

男人绑在田头税,婆娘捆在地头税。

娃儿装在壮丁税,媳妇裹在灶头税。

牛要税,猪要税,鸡要税,鸭要税,

行要税,坐要税,生要税,死要税,

敲骨吸髓刮民党,万税!万税!万万税!

歌谣中用谐音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恶行径。还有一类歌谣如《军阀遭天杀》、《龟儿刘湘要垮台》、《骂声保长不是人》,勾勒了敌人的丑态,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敌人残暴、贪婪、狡猾的本性,既是对苦难的控诉,也是对旧世界的鞭挞。

(二)“穷人最爱苏维埃”

时政歌表达了民众鲜明的爱憎,既是刺向敌人的匕首,同时对一切革命运动、新生事物、代表群众利益的领袖人物,又热情地讴歌、赞美,成为民众唱给新时代的颂歌。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前,共产党在川东北已有长期的工作基础,1923年,王维舟在宣汉县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达县有了“中山青年团”组织,1927年秋到1928年春,大竹、达县、宣汉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1929年4月,李家俊、唐伯仕等人在万源发动了固军坝起义,打响了川东武装起义第一枪,随后建立了川东游击军。朱德曾说:“有着这一批本地的游击队伍,才使红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8]红军入川,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一呼百诺,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就显得十分自然。且看下面两首红歌所唱:

天下穷人似干柴,生满山沟长满岩,

红军路过播火种,铺天盖地燃起来。

工农大众团结紧,跟着红军创穷根。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

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为民众带来了切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民众拍手高歌:

要吃米,把秧栽,要过河,把船摆。

穷人要想得自在,快快建立苏维埃。

苏维埃,苏维埃,穷人拉手走进来。

土豪劣绅发了抖,穷人欢笑乐开怀。

村村建立苏维埃,土豪劣绅要倒台。

这是民心向背的真实、自然、质朴的反映,是一种歌吟,更是一种呼声。它有感而发,“不唱不

开怀”,自生自灭,不求功利。关于这类“民间文化形态”的作品,陈思和教授曾有精辟论述:“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9]自由自在是时政歌的基本文化形态,是它最可贵最有价值的内核,唯其如此,它才给世界留下“心声”和不加掩饰的形骸。

参考文献:

- [1] 陈世松. 天下四川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8.
- [2] 童恩正. 古代的巴蜀[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121.
- [3] 徐世群. 巴蜀文化大典:竹枝词[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76.
- [4] 乌丙安. 民间文学概论[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163.
- [5] 苑利.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6.
- [6] 魏传统. 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序[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1.
- [7] 孟兆怀.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第一辑[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56.
- [8] 邓金德. 四川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4):52.
- [9] 陈思和. 中国文学史教程:前言[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2.

[责任编辑 范藻]

On the Creation of Red Ballads and Current Politic Lyrics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HEN Zheng—pi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red ballads with magnificence and local features were created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As a form of folk oral literature, these ballads livingly recorded the great society changes which have been lightening in history. True and sincere, the songs sang praises of the masses' lov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Besides, they effectively supported the armed strugg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viet area of the days. These ballads perfectly combined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with the familiar folk lyrics, among which, the current politic lyrics brightly reflect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limate at that time and the comments and criticism from masses on the reality.

Key words: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red ballads;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current politics song